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4.008

《马桥词典》中地理意象研究

邓统湘, 李心怡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韩少功《马桥词典》中存在诸多地理意象, 其具有多维象征意蕴。从敬畏自然的哲思、灵性生物的隐喻、生存景观的表征, 到历史记忆的见证, 这些地理意象展现了万物有灵的浪漫思维与物我相融的理性认知; 其作为展现乡村中国深厚文化根脉和复杂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 复苏了巫楚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古老韵味, 揭示了传统乡村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生存挑战与文化转型, 为理解乡村社会的复杂文化现象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关键词: 《马桥词典》; 地理意象; 万物有灵; 物我相融; 巫楚文化; 传统乡村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4-0066-07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es in *Maqiao Dictionary*

DENG Tongxiang, LI Xiny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geographical images in Han Shaogong's *Maqiao Dictionary*, which have multi-dimensional symbolic implic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reverence for nature, the metaphor of spiritual creatur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iving landscape, to the witness of historical memory, these geographical images show the romantic thinking of "everything has spirit" and the rational cogni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ings and self.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show the profound cultural roots and complex social life of rural China, they revive the ancient charm of Wu Chu culture and farming culture, reveal the survival challenge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e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cultural phenomena of rural society.

Keywords: *Maqiao Dictionary*; geographical image; "everything has spirit"; integration of things and self; Wu Chu culture; traditional villages

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 深信“文学有‘根’, 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

的土壤里”^[1]。他以本土文化为镜, 深思熟虑地铸造文字, 其思绪之根, 深埋于湖南汨罗的沃土之中。

收稿日期: 2024-02-19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专项课题“‘双新’背景下湖南乡村教师精准培训策略研究”(JF235403); 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实践教学多域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与实践”(HNJG-20230736)

作者简介: 邓统湘, 女, 湖南醴陵人, 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学科教育(语文)。

他的小说《马桥词典》创新词典式叙事,将湖南汨罗的风土人情浓缩于115条词条中,绘制了20世纪70年代马桥乡村的生活画卷。“地理环境中的自然景观、风土习俗、人文精神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的审美心理”^[2],而作家的影响力也会反哺当地文化,“使人文之化成、文学之审美,与地理元素互动、互补、互释,从而使精神的成果落到人类活动的大地上”^[3],进而形成良性互动。《马桥词典》精心捕捉并忠实记录了丰富的马桥地理意象,以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展现了一幅独具美学气质的文化风景。

学界关于地理意象的解读多样而未成一致,张伟然认为“地理学中对于意象(Image)的理解相对较简明,它指的就是客观世界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4],即人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曾大兴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文学地理学所讲的地理意象,乃是可以被文学家一再书写、被文学读者一再感知的地理意象,它们既有清晰的、可感知的形象,也有丰富而独特的意蕴”^[5]。刘洁强调“文学地理学更重‘意’之构成及客观物象的地理性所蕴含的审美价值”^[6]。统而言之,地理意象是文学作品中能被作家和读者反复感知的具有独特意蕴和地域色彩的元素。地理意象研究法将文学意象与地理意象相结合研究作品,拓展了文学研究视域,赋予文本解读独特视角。

依据《马桥词典》的特点,其地理意象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地名地理意象,如幻想之地马桥、龙家滩、张家坊、长乐街与实境之江西、平江、长沙等,构建了虚实交融的地理画卷;二是地景地理意象,如罗江、朱牙土、月口、猫形塘、台湾丘、神仙府、天安门、官路、清明雨、瘴气等,绘制出复杂多彩的地理风景;三是动物地理意象,如龙、狗、牛、蛇等,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象征与神秘色彩;四是植物地理意象,如枫树、黄藤、桃树、莠苇等,散发出地方特有的生命气息与自然韵律。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细腻勾勒这些地理意象,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嵌入其中,让作品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美学风貌。

一、隐含与显示的交织:地理意象中的多维象征意蕴

《马桥词典》以知青视角记录、解释马桥常

见方言词汇。地理意象作为当地语言的常客,既是显示的语言表达,又携带着隐含的象征意蕴;既是马桥人与自然、社会交流的直接体现,也隐含着其对生活、文化乃至哲学的深层次反思。它们穿梭于显性的日常生活与隐性的文化记忆之间,构成了一条通往马桥深厚文化底蕴与精神风貌的秘密通道,让读者得以窥见那片土地上的生活气息和时代脉动。

(一) 敬畏自然的哲思

地理意象的书写往往呈现人对自然的认知,通过“罗江”“枫鬼”和“黄茅瘴”等词条,可以窥探马桥人与自然界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敬畏自然的深邃理解。

“江”作为众词条之首,在马桥泛指一切水道,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包括小沟小溪。对“江”之概念的泛化并非源于对水道的不熟悉或认知上的距离,相反,它反映了马桥人与水的密切联系。

“罗江”词条中细腻勾勒了马桥人与江的互动画面:渔民在江中撒网;孩童在岸边嬉戏;船工以筏子连接两岸的交通。洪水季节,罗江泛滥成灾,席卷走了家畜,冲毁了房舍,但也意外地带来“大水财”,如江上漂来的废旧家具等,为马桥人提供了意外的生活补给。马桥人受惠于罗江,又惧怕、敬畏着罗江,他们认为江里住着些鬼神,如引发洪水的龙六爹、不让貌美之女平安渡河的溺水女鬼。这些传说赋予了罗江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秘色彩。罗江不仅是生命之源,也是人与自然、现实与超验之间交织的神秘界面。

马桥的心脏地带屹立着两棵古老的枫树,称为“枫鬼”,马桥人对“枫鬼”的畏惧中混合着敬意。其一方面是人形的树瘤在山火之后依然屹立不倒的姿态和树上常年聚集不散的鸦群这些超自然的属性,让马桥人深信“枫鬼”拥有辟邪避灾的神秘力量;另一方面是“枫鬼”以其破坏力,给了马桥人深刻的教训。马鸣在绘制“枫鬼”之后,遭受了无法解释的身体疼痛;“枫鬼”导致马桥暴露于日军炸弹的攻击之下,造成人员伤亡;公社为破除迷信,将树砍了做成排椅后,奇怪的瘙痒症在村寨蔓延,村民视之为报应。种种关于“枫鬼”的传说,反映出马桥人内心深处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其根植于对自然与超自然的敬畏——任何对自然的侵犯最终都会遭到报应,同时也传

递着马桥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寻求和谐共存的传统智慧和价值观。

瘴气是自然界的严苛赠予,是一个既真实又神秘的存在。“黄茅瘴”一节中,细致描绘了这一现象。瘴气多出现于中国南方山林地区,为湿热环境下动植物腐败而产生的有毒气体,其在马桥四季更迭中呈现不同的面貌:春天的春草瘴、夏日的黄梅瘴、秋季的黄茅瘴、冬季的寒气瘴。面对瘴气频繁的威胁,马桥人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应对仪式。仪式始于前夜的准备:禁忌烟酒、避免轻佻言行、严禁房事和烧香敬拜山神;第二天出门前再喝苞谷酒壮阳,并于屋子北角劈竹筒驱魔。敬山神、驱魔邪等巫术行为,显然并非源于对瘴气科学本质的了解。在马桥的认知中,瘴气是自然界对人类行为的惩戒,所以,其应对之法,既融合了对自然的敬畏、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也展现了一种古老而深刻的与自然和解之道。

(二) 灵性生物的隐喻

马桥世界里的动物群像有“龙”“龙(续)”“军头蚊”“红娘子”(蛇)“黄皮”(狗)“豺猛子”(鱼)“洪老板”(牛)“三毛”(牛)“黑相公”(野猪)等,其覆盖了从神秘的龙到常见的蚊子、蛇、狗、鱼、牛、野猪等多种生灵。文中书写这些动物词条时,不止于勾勒它们在马桥的存在与传说,还赋予其灵性与人性,将它们与马桥的人物、生活乃至社会价值观联系起来,使之成为马桥文化与精神生活的象征载体。

在马桥的叙事中,“蛇”的意象隐喻着邪恶与淫欲。马桥人认为,利用女性形象的木偶引诱蛇、夜间携带竹棍以及呼唤“红娘子”,能够逃避毒蛇的攻击。马桥人应对蛇的种种方式,体现了他们对蛇这一生物的恐惧以及尝试与之共存的努力。马桥人不食蛇肉,认为其会损害人的纯朴本性,但蛇胆又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药用价值。希大杆子是定居马桥近20年的外乡人,因其偏爱蛇肉的行为,加深了马桥人对他的排异程度,但希大杆子的医术和他带来的新奇洋物,让村民们不得不与他保持一种复杂的交往关系。后来,由于制作长生丹的药方丑闻败露,希大杆子成了道德抨击的对象,并最终被驱逐出马桥。蛇的意象与希大杆子的命运相互映照,展示了马桥社会对“异己”既有排斥又试图从中获益的复杂心理。这些故事

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马桥社会对未知与异己事物的恐惧与排斥,以及马桥人在传统信仰与现代观念交织下的挣扎与困境。

在马桥的文化语境中,“龙”的意象具有双重内涵。在这里,本体义上的“龙”,传承了中国古典文化中龙的内涵,其融合了鹿角、鹰爪、蛇身、牛头、虾须、虎牙、马面、鱼鳞等多种动物特征,成为马桥人生活中的守护图腾;象征义上的“龙”,则作为马桥一种粗俗的隐语代指男人阳具,其与性别认同及社会地位紧密关联。万玉这个失去“龙”的男人,其性格和行为女性化,家庭生活走向破碎,孤独与不被理解成为其一生的主旋律。他的命运昭示了性别模糊所引起的社会边缘化和个人孤独感,以及社会对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刻板期待和偏见。万玉的死亡和之后社会对他的重新评价,揭示了马桥社会中性别与身份认同的复杂状态。

牛是耕作的伙伴,但在马桥这里,“牛”是蛮横与撒泼的代名词。马桥故事中的两头牛:“洪老板”与“三毛”,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与象征意涵。“洪老板”这头生来就耳朵有缺口的牛,被认为是作恶多端大土豪洪老板的转世,其反映了马桥人对因果循环、善恶有报的笃信。“三毛”则是一头性格火爆、好斗且难以驯服的牛,其行为举止充满了挑衅意味与诡谲色彩;特别是在与“我”的互动中,其充分展示了对抗权威的生命力。两头牛的最终命运是:“洪老板”被沉于泥潭;“三毛”则败于驯养者之手。在马桥人眼中,这既是它们一生恶报与反叛的终极报应,也验证了马桥人关于因果循环与社会秩序的基本态度。

(三) 生存景观的表征

生活在马桥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生存的坚韧、对社会地位的向往以及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构成了他们生活的核心主题。无论是在朱牙土上的辛勤耕耘,盐午仿建的“天安门”,还是村民对葛玮这一神秘植物的热衷向往,每一处生存景观都呈现出马桥人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心态和行动意识。

对于马桥人而言,土地是生存的基础,更是情感纠葛与命运交织的舞台。小说以深情而又激昂的笔触,绘制了马桥人与“朱牙土”纠缠斗争的生活画卷。朱牙土,这种深红掺白的土壤,因其酸硬、贫瘠的特性,成为了马桥人日复一日必须

面对的挑战对象。这块土地见证了太多类似兆青长子罹难的悲欢离合,成为马桥人生与死、希望与绝望交织的表征。尽管朱牙土的贫瘠与难以开垦给马桥人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艰辛,但他们从未放弃对它的耕耘。他们以所需禾种的数量来命名田地,如“三斗丘”“八斗丘”等,直观表达了他们对生产的需求。这份对生存的渴望和对土地的情感,牢固植根于每一个马桥人的心中。

随着生产需求的逐步满足,马桥人的目光逐渐转向了社会需求——即对“格”的评价与追求。“一个人的资历、学历、出身地位、信誉、威望、胆识、才干、财产、善行或者劣迹,甚至生殖能力等等,都会使当事人的格发生变化。”^[7]“格”在马桥社会中是衡量个体社会地位与价值的综合指标,拥有高“格”的人,在马桥享有显著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天安门”和“葛玮”两个词条生动展示了即便是所谓的小人物,也可以不懈追求“格”的提升。

“天安门”是马桥人盐午仿造北京天安门的样式在张家坊地界修建的宅院大门楼。盐午自幼就背负着复杂家庭成分的重压,他曾经珍视的一张天安门画片被没收,象征着他在青少年时期就遭受了“格”的剥夺。这段经历在盐午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成为他之后力图翻转命运、重塑个人价值的重要动力。多年后,盐午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和聪明才智,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为自己获得了重塑自我之“格”的机会:建造一座象征着权力与尊严的宅院大门楼“天安门”。随着“天安门”在马桥乃至周边地区的名声日隆,盐午的社会“格”也水涨船高,他终于在马桥社会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话语权。

“葛玮”是一种珍稀的药用植物,其色泽鲜红如血,形态犹如包菜,具有理气补血、滋阴壮阳、保胎延寿的药用价值,是马桥人眼中的珍宝。相传只有那些生前显赫一时、权力在握的人死后,其口中才可能孕育出这般奇异之物。因此,葛玮在马桥成了“格”与“话份”的直接表征,是对一个人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的最高肯定。在兆青、万玉等人的眼中,像罗伯、本义、周秘书、何部长这样的社会精英和干部,因为拥有高“格”和优渥的生活,死后有可能长出更大的葛玮。这一信念驱动着马桥人在挖坟砖建粮食仓库时表现出

极大的热忱。大家不论胆子大小,都怀着一颗向往高“格”的心,希望能够找到这种象征社会认可与尊荣的葛玮。这份对葛玮的热衷,实际是对“格”和社会地位的渴望,是对社会认同和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

(四) 历史记忆的见证

某些地理意象,如同历史的细节,被巧妙地编织进马桥的日常与记忆之中,诸如“荆界瓜”“军头蚊”“官路”等都携带着一段马桥的历史痕迹,共同构成了马桥这片土地上独有的时空纹理,见证了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以及他们与自然的深刻关系。

“荆街”曾是马桥一条热闹繁华的街道,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马文杰曾在“荆街”组织“规劝会”,致力于响应共产党的政策,通过劝降活动,试图重新引导敌伪军政人员及各类流匪归顺。然而,由于投诚行为真假混杂,规劝会的行动最终演变成“规劝会暴乱”,多位参与者惨遭射杀。由于种种原因,“规劝会暴乱”多年后才被政府宣布为一起冤案。“规劝会暴乱”之后,“荆街”随之沦为诡异之地,街道上开始出现鬼魅徘徊、火灾频发、婴儿异常、鱼塘中鱼类不育等怪异现象,原本热闹的街道渐渐人去楼空,最终变成一片荒废之地。然而,多年之后,“荆街”废墟孕育出了肥沃之地,生长出名为“荆界瓜”这样的珍品,并因其甘甜之味声名鹊起。当人们追溯此瓜之源头,“荆街”的旧事重现于世,成为引发马桥人共鸣的记忆。

“军头蚊”是一种体形微小但毒性强烈的蚊子,其以黑色身躯和头部白斑为标志,这种蚊子咬人后留下的奇痒持续三日不止。传说“军头蚊”并非马桥原生,其是随着彭叫驴子领导的国民党军队而闯入马桥的。这支部队意图围剿马文杰及罗江一带的抗日力量。其在长乐街驻足十日后,留下了这恼人的蚊种。这一外来微小生物的出现,改变了马桥的自然生态,也成为了那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生动注脚。“军头蚊”提醒着后人,即使是最微小的生命也能成为历史长河中的记忆碎片,承载着过去的纷扰与今天的回响。

在马桥的地理记忆中,“官路”占据了一席特殊之地。这条古老的岩板小径,从山外蜿蜒至马桥的心脏。相传,这条“官路”是马桥籍的官

员仕途得意时,为彰显归乡之荣耀,特意命令罪人修建而成的。这是一条连接外界与马桥的通道,其见证了权力与荣耀、罪责与救赎交织的历史。

二、浪漫与理性的交融:地理语境中的双重认知诠释

地理意象在马桥地理语境中被赋予了人性化和灵性化的特质。马桥人对万物有灵、物我相融的精神信仰和认知,突显了他们对生命共生共享与和谐共生的追求。

(一)万物有灵的浪漫思维

万物有灵的浪漫思维作为马桥人核心认知模式,贯穿于其对地理意象的描述和理解之中。这种思维模式强调与自然和超自然世界的紧密联系,认为自然界充满了生命力和神秘力量;这些力量既能带来福祉,也可能引致灾难。在马桥的地理语境中,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对自然现象的神秘化解读、对语言的模糊化表达,以及对宿命和因果报应的深信不疑,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和认知深度。

基于这种思维模式,马桥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充满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如罗伯的个人禁欲生活方式与其家中桃树仅开花不结果的现象间的联系,显现了将个体行为与自然现象直接相关联的“万物有灵”思维模式;枫树被赋予超自然的生命力,其在灾难中的幸存以及对砍伐行为的“报复”,进一步深化了自然物的神秘化和人格化;在瘴气季节上山采集草药时,马桥人遵循一套特定的驱邪仪式以避免不祥,这是“万物有灵”思维模式在实践中的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反映了马桥人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深刻理解,同时也展示了文化如何在地理语境中塑造和反映群体的认知与实践。

此外,万物有灵的思维还体现在马桥人对语言的模糊化处理上。“江”泛指一切形式的水道,展现了马桥人对自然现象的宽泛认知与神秘化处理。类似还有词条“甜”,无论是糖、鱼、肉、苦瓜,还是辣椒,其味道均被统一标注为“甜”。这种分类方式超越了传统味觉感知的界限,是马桥人对味觉体验的非具体化和情感化解读。这种语言上的模糊性和神秘化进一步扩展至日常交流,如使用“栀子花、茉莉花”等花名来表达不确定性或模棱两可的情境;口语中富有诗意的表达,

如“雨是要下的,我看下不下来”,则体现了马桥地理语境对于含蓄、暧昧和神秘感的偏好。马桥人通过非精确、非直接的描述方式,营造了一种万物有灵的浪漫氛围与情感共鸣。马桥人对现实与超自然界限的模糊认识,以及对复杂现象的简化处理与情感化表达的倾向,展示了其对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的文化应对策略。

最重要的是,万物有灵的思维所衍生的宿命观,为马桥人提供了一种对生命苦难和社会不公的解释框架。这种宿命观不仅反映在对个体命运的解读上,如“洪老板”词条中,将一头左耳有缺口的牛视作恶行累累的地主洪老板的转世,以此来彰显恶有恶报的宿命观念;也体现在对生命循环和自然法则的认识中,如“根”词条的阐释中,将人的手纹、脚纹比作“根”,进而将人的命运命名为“根”,暗示了一种宿命的不可逃避性——36岁后,人的本性与命运定型,任何尝试改变的努力都是徒劳。这种宿命观深植于对万物有灵、因果轮回的信仰之中,马桥人因此坦然接受生活中的不幸与不公,将之视为宿命的安排与天道的轮回,其在心理上为个体和社群提供了一种应对生活苦难的策略和安慰。

(二)物我相融的理性认知

物我相融的理性认知体现了马桥文化对自然与人关系的深刻理解。这种认知方式突破了传统的自然与人类的二元对立,强调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强调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界的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马桥的地理语境中,这种认知方式显现在对自然事物的命名和分类上,也体现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和对自然法则的理解上。

马桥人通过对自然界事物命名和分类过程中的人化和情感化,展现了一种物我相融的理性认知方式。如罗人历经逃难至马桥地带后建立“罗城”,周边的水道由此被称为“罗江”。马桥的牛,悟性高的叫“懂”牛,养得亲的叫“挂栏”;此外,每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如洪老板、三毛。马桥人根据形状、所需禾种的数量、政治口号给田地命名为“蛇丘”“八斗丘”“团结丘”等。这些命名的做法不是简单地对自然的观察与分类,而是将自然环境视为文化身份和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空间,将自然界事物转化为马桥地理语境中文化认同和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构筑起一种深

层次的物我相融的生态文化观。

马桥人在与自然事物的互动中展现了对自然现象的深刻洞察和人性化解读, 其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投射到对自然界的认识 and 解释中, 形成了一种物我相融的文化认知模式。如在赛龙舟的传统中, 马桥人将“龙”船视作具有生命力的实体。为了在比赛中发挥最佳状态, 他们采取“船坐人”的仪式性做法, 通过人力将船只运至起跑点, 为“龙”船保存能量, 显现出对自然事物与人类活动共享生命力和能量的文化认知特点。又如将田地区分为“公地”和“母田”, 将“母田”与女性生理特征相联系。在这里, 男性与女性分别负责不同阶段的农作。这些农业生产中的性别角色和行为习俗, 均体现了马桥人对自然法则的尊重和利用, 以及对物我相融、生命力共生共享的深刻认知。

在马桥地理语境中, 既有关于自然神秘力量的浪漫思维, 也不乏对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的理性解读。马桥人这种浪漫与理性交织的认知方式, 使其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中, 对事物有一种独特的诠释方式。在他们眼中, 自然界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被视为拥有生命和灵性的实体, 自然界不再是人类外在的、需要征服或利用的对象, 而是与人类共生、共享情感和文化价值的伙伴。“万物有灵”“物我相融”的认知观念, 为马桥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和解释世界, 使他们能够在尊重传统和自然的同时, 也能够适应和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三、传统与现实的交流: 地理篇章中的深层文化根脉

《马桥词典》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 将地理意象精心织入深厚的乡土文化底蕴, 赋予丰富的文化意涵和时代印记。其通过对马桥这一特定乡村地理图景篇章式地展开, 复苏了巫楚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古老韵味, 揭示了传统乡村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生存挑战与文化转型。

(一) 巫楚文化的传承

“与其他区域的文学创作相比, 生长在楚地、流着楚人血液的 20 世纪湖南作家们在文学的寻根过程中不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楚文化的核心部分——巫, 而且与众不同地把巫作为一种正

面形象加以肯定, 也就是说对巫的生命形态所作的是一种审美化的艺术观照。”^[8] 巫楚文化, 携带着悠久历史的沉香、深邃神秘的色彩以及那些根植于人心的独特民间信仰, 成为了《马桥词典》中地理意象丰富多维的文化背景。

马桥这个古老的村落, 深藏着巫楚文化的千年遗韵; 马桥的每一缕风、每一滴水中, 都弥漫着巫文化的气息, 信鬼好巫、多神崇拜的传统根深蒂固于这里的土壤。水水的疯狂不是单纯的精神错乱, 她化身为能通过梦境预知未来的梦婆, 她的存在让马桥的夜晚更加神秘莫测(《梦婆》); 引发石臼与磨子之间冲突不是因为两家主人的恩怨, 而是因为巫风在日常器物中的鬼魅附体(《台湾》); “走鬼亲”的传说, 将转世与认亲的奇异现象带入了马桥人的生活, 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抹超自然色彩(《走鬼亲》)。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传说, 是马桥人对于巫文化信仰的真实写照。翻脚板的嘴煞(《嘴煞》)、结草箍的誓言(《结草箍》), 这些巫术实践是马桥人用以调解矛盾、维护社群和谐的独特方式。小说中的地理意象浸透着鲜明地域特色, 弥漫着神秘而浪漫气息, 形成了奇幻诡谲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

(二) 小农文化的赓续

小农文化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农耕历史, 是农业文明的基石。小农文化, 在马桥这片古老而肥沃的土地上得以赓续, 体现在马桥人对土地的勤恳耕耘上, 渗透于马桥人的生活纹理和社会结构之中。

农耕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不仅是稻谷和庄稼, 更是中国人那份勤劳肯干的精神。质硬贫瘠的朱牙土, 被马桥人视为生命之源, 这是对自然的敬畏与珍视; 在清明雨期因不能劳作而惶乎恍惚, 讽刺不劳作、学懒的马鸣等人的居住地为“神仙府”, 这是对勤劳价值的尊崇。

小农文化的深远影响在马桥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显而易见。马桥人巧妙地将日常饮食转化为强化亲缘关系的纽带, 如以“同锅兄弟”称呼同胞兄弟, 用“前锅婆娘”指代前妻, 而结婚则被形象地称为“放锅”。更有趣的是, 饮食相关的表达方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互动中, 成为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吃粮”成了当兵的别称, “上次吃狗肉”暗指村里的干部会议, “打耙耙”或“杀

猪”成了年关的代名词。“模范”的选举,更是马桥人小农文化价值观的生动体现。马桥人依据天气和农活的需要来决定“模范”的人选。在雨天,由于无法进行农田劳作,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如复查,被推举为“模范”,以发挥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而在晴天,当大家都忙于田间劳动时,“模范”的角色便落在了那些无法承担重农活的人身上,比如万玉。

(三) 现代文化的碰撞

马桥这一与外界的现代文化隔绝的乡村地理空间,是现代文化涌动的边缘地带,是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外来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舞台。

20世纪70年代,马桥人仍处在封闭落后的生活状态中,他们对外界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抱有本能的警惕和抵制态度。这种抵制不仅体现在生理反应上,如坐车会晕车,乘船会晕船,甚至走在城市的街头也会感到“晕街”;更深层地反映在心理层面的排斥与自我保护上,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促使人变得懒惰的外来知识,与他们勤劳朴实的生活价值观格格不入。因现代化进程可能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而引发的种种本能恐惧、不信任和防卫,实际上是深深根植于农耕文化自给自足心态的外化,本质上是对勤劳朴实传统生活价值观的坚守。

然而,马桥的封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被不断打破,一些因外界变动而起的变化正在预示现有权利秩序的微妙变迁”^[9]。随着外界政治权力和现代性文化的涌入,马桥人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这种碰撞并非单向压制,其也激发出马桥人对现代文化独特的解读和应对策略。如象征着国家权力中心的“天安门”,映射了马桥人对于权力、尊严和身份认同的一种象征性追求;“台湾丘”体现了马桥人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主题的一种本土化表达;“公田”作为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概念,反映了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对马桥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影响。这些承载了政治文化印记的地理篇章,

正是马桥的社会变迁和马桥人应对现代生活的生动映射。“黑相公”的故事尤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的缩影。知青们的到来,带来了城市人的观念、知识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文化开放和思想更新。在这个过程中,马桥人通过命名、故事讲述等方式,将这些外来元素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展示了乡村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和谐的智慧与方法。

在《马桥词典》的地理篇章中,作者通过对马桥地理意象和社会生活的深度挖掘,呈现了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变迁。从巫术实践到小农生活,再到现代文化的冲击,映射出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阶段轨迹。在这一过程中,小说以历史的纵深感和对现实的关怀态度,让读者在地理的坐标与文化的纬度之间,体验到作者深深扎根于土地之中的深情厚爱,引发他们关于乡村社会在时代变迁中命运的严肃思考。

参考文献:

- [1] 韩少功. 文学的“根”[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 77.
- [2] 金宁黎. 文学地理学视角下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意象[J].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 2023(25): 96.
- [3] 杨义. 文学地理学会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5.
- [4] 张伟然. 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33.
- [5] 曾大兴. 文学地理学的六个研究方法[J]. 中文论坛, 2017(1): 299.
- [6] 刘洁. 地理意象的构成及其审美价值[J]. 社会科学动态, 2019(1): 81.
- [7] 韩少功. 马桥词典[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179.
- [8] 龚敏律. 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楚文化[J]. 中国文学研究, 2005(2): 98.
- [9] 陈玉. 论《马桥词典》的地方性叙事与现代性反思[J]. 长江小说鉴赏, 2023(10): 79.

责任编辑: 黄声波